

論蒲壽庚降元與泉州地方勢力的關係

(一) 桑原隲藏以來對蒲氏重要性的討論

自從二十年代桑原隲藏先生發表其有關宋元之際泉州西域人蒲壽庚的一系列論文，【註二】開始引起學界對蒲氏的注意。桑原先生的論文其後增補編輯成書，取名「蒲壽庚の事蹟」，【註二】這本書有馮攸及陳裕菁兩個中譯本。【註三】其後羅香林先生亦根據新發現的蒲氏家譜而作出更多的補充，出版了「蒲壽庚研究」一書，【註四】其他有關的研究，如羅榮邦先生談論宋元明海軍的論文、【註五】張秀民、前嶋信次、杉本直治郎先生對蒲氏阿剌伯背景的分析、【註六】李東華先生對泉州海外交通史的探討、【註七】都進一步肯定了蒲氏在宋元鼎革之際的重要作用。【註八】

表面上，蒲壽庚的歷史重要性在他領導泉州拒納南逃的宋室，並且投降元人。可是從咸淳十年（一二七四）九月，伯顏督率蒙漢大軍沿漢水而下，先後破宋軍於沙洋城、羅陽堡、丁家洲等役，各重要州郡已甚多不戰而降，【註九】此時雖然不乏忠貞節義之士，仍能不屈不撓地堅守宋室祿臣的崗位，但地方守臣將領已類多心懷貳志，元軍壓境之時，棄城易幟者比比皆是。及德佑二年（一二七

六)正月謝太后獻國璽請降，宋人抗元的士氣更大受打擊，各地望風投靠的更為普遍。也就是說蒲壽庚以泉州降元，在當時絕非特異之舉，然則其重要性又何在？引用桑原先生的話：

「蒲壽庚棄宋降元之事，影響於宋、元運命之消長，至為重大。蓋蒙古軍之陸上戰鬥力，當時雖有天下無敵之慨。然其海上活動，殆全無能力可言。……而今管理海上通商，精通海事知識，且能自由調遣多數海船之蒲壽庚，竟降附於元，且助元以征伐東南。此就元朝方面言之，可謂獲得莫大利益。然就宋朝方面言之，則實受無上之打擊矣。」【註一〇】

羅香林先生亦申其旨：

「(蒲壽庚)集南宋沿海財政與軍事大權於一身。……元師席卷而南，蒲氏乃以泉州降。宋室流離瑣尾，既失市舶財利，復喪舟師實力，憑藉既虛，雖有張世傑、陸秀夫、文天祥諸賢臣奔走勤王，亦無補於國運之傾移矣！其影響於宋元時局之遞變者，至鉅且大……」【註一一】

是見蒲壽庚之重要，端在其降元後引起雙方海軍勢力消長的作用。這個論斷有幾點基設：(1)蒙古人不擅海戰；(2)蒲壽庚個人對泉州一帶擁有絕對的控制權，降元之舉，純是他個人心懷異志的結果；(3)蒲壽庚擁有強大的海上勢力，適補元軍之不足，而這股海上勢力則建基於蒲氏長期對南宋商業和水軍的控制。

第一點是不少學者對蒙古軍隊的一般印象，桑原先生曾舉出以下數例來證明這點：

- (1)西征及攻蜀時蒙兵渡河多用牛皮船；
- (2)高麗王遁竄江華島四十年而元人不能屈服之；

(3)元世祖至元七年(一二七〇)元將劉整與阿朮為預備進攻漢水流域而大練水軍，期補蒙軍之短；

(4)周世宗征南唐亦招南人以練水軍，可見南人較北人擅水戰。【註一二】

這些例子顯示沙漠遊牧部族出身的蒙古軍隊在忽必烈登位之初仍不擅水上戰鬥。但從伯顏南下漢水，屢敗宋軍水師看來，【註一三】這似乎並未構成元軍的弱點，或至少可說蒙古人和北方漢人組成的南征軍在水戰方面絕不遜色於南方的水軍。高麗方面，元世祖中統元年(一二六〇)高麗元宗即位，降服於元而成其藩屬；及至元十一年(一二七四；即咸淳十年)十月，已能動員由蒙漢和高麗軍三萬多人、大小船艦九百艘組成的艦隊，出發遠征日本。此役與伯顏征宋軍出師幾乎同時進行，可見這時的元軍雖非以海戰見稱，但其强悍的作戰能力也並不受波濤所阻撓。【註一四】關於蒙元水軍的問題，近年已有較深入的研究，總的來說，其發展之神速，以及實力之強大，都漸成學界的定論。【註一五】不過元軍海戰能力多強並非本文的研究重心，這一點姑置不論。

關於第二點，自來談論蒲壽庚者多接受這項基設而無異議，也沒有人作出詳細的論證。至於第三點則涉及蒲壽庚在宋末曾擔任過什麼官職，以及任職久暫的問題。比較普遍的看法是：蒲壽庚在泉州提舉市舶十多年以上，【註一六】因此控制了海上貿易財源；此外他在咸淳末(一二七四左右)陞任福建安撫沿海都制置使，桑原先生釋為福建安撫使兼沿海都制置使，則閩地一路兵事民政以及沿海水軍皆歸其統領；【註一七】景炎元年(一二七六)獲授命為福建廣東招撫使，不特進一步鞏固了他在當地的海陸軍權，而且將其勢力由福建申展到廣東。【註一八】

對於這兩點，筆者認為仍不乏討論的餘地。由於有關蒲壽庚的史料十分零碎，加上明人民族意識高漲，在各種地方性筆記雜史內痛罵蒲氏時不免揉雜不少傳聞稗史，其中真假參半，也有些虛構誇張之處。要重建這段歷史便不能過份執著於方志上的一字一句，而須將泉州當地的情況加以全面的考慮。以下先檢討蒲壽庚仕宋的官歷及其勢力的範圍。

(一) 蒲壽庚仕宋官歷及其勢力範圍的再檢討

「宋史」卷四十七「瀛國公紀」載蒲壽庚降元事略如下：

「（景炎元年，一二七六，九月）是月，招討也的迷失會東省兵于福州。……（十一月）乙巳，（益王）昀入海。……昀欲入泉州，招撫蒲壽庚有異志。初，壽庚提舉泉州市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昀舟至泉，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或勸世傑留壽庚，則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没其貲，壽庚乃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昀移潮州。……（十二月）戊辰，蒲壽庚及知泉州田真子以城降。」

由這段文字看，蒲壽庚仕宋的官職有二：市舶使及招撫使。近人對宋代市舶司的研究不少，大致上它的職權在管理一切有關海上貿易的事務，如蕃舶進出的登記、徵收關稅、買賣官方規定的禁權商品、招徠及款待蕃商等。【註一九】佔有這個官位，自然對經商用的海舶有一定的控制。不過這種控制也不過是一種官僚式的剝削，即所謂「擅蕃舶利」，並非真能隨意調度所有的商船；而且一個市舶使的權

力只限於一個港口，蕃商海賈真的無法忍受時，大可轉到其他港口，【註二〇】所以市舶使對海舶的控制，實難達到上引「宋史」張世傑謀者所謂「凡海舶不令自從」那種地步。一個區區市舶使權力大得可以調遣所有的海舶，不特有宋一代從無此例，而且與趙宋因防範割據勢力而將地方政府職權分散的一般政策也絕不相容。這句「凡海舶」之海舶若指蒲壽庚個人擁有的商船，倒較合乎情理。世傑後來「掠其舟并没其貲」，對象正是這些蒲家海舶。市舶使對一般海商船舶控制的限度如此，但設使蒲氏盤據其職為時甚久，也可能構成一個例外，不可一概而論。那蒲壽庚究竟提舉泉州船多久？

桑原先生根據上引瀛國公紀「蒲壽庚提舉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語，認為蒲氏在淳祐十年（一二五〇）以後任舶職達三十年。【註二一】羅香林先生則據泉州南安九日山祈風刻石及「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六「職官上」的市舶使名單指出蒲壽庚任舶司當在開慶元年（一二五九）以後。【註二二】可是據陳自強先生及土肥佑子女士的研究，景炎元年前三十年間，有案可稽的泉州市舶使人數亦不少。從祈風刻石上見到最晚的一位市舶提舉使是王櫛，立碑時^祐咸淳二年丙寅（一二六六）。則蒲壽庚就職日絕不能早於一二六六年。去景炎元年僅十年。【註二三】王櫛即王茂悅。周密「癸辛雜識別集」「林喬」條云：

「林喬，泉州人。頗有記問。初，游京庠，……旋登徐杰之門。……（寶祐癸丑）遂中魁選。……久之，上書特補保義郎。……時景定（一二六〇—一二六四）初也。繼又赴有官漕試，得薦登第。隨被論駁。經營復得官戎議之類。還寓信州，朱浚為守，不往見，且語詆之。朱怒，据摠其罪，押回本貫。與蒲舶交，借地作屋。王茂悅為舶使，蒲八（人？）官人者，漏舶事發，林受

其白金八百錠，許爲之言。既而王罷去，蒲併攻之，且奪其所借地。乃往從元杰之子直諒。……後以詞訴爲徐帥擇齋明叔所治，押往五年（羊？）摧鋒軍寨拘鎖而殂，時咸淳二年（一二六六）也。……【註二四】

也可證王茂悅景定末年確爲泉州舶使。

陳自強先生進一步認爲「惠安縣志」、「泉南雜誌」、「閩書」、「古今圖書集成」等明清文獻均載壽庚在咸淳末始因退海賊功而得官，但只累官至福建安撫沿海都制置使，並非提舶；蒲氏只是在景炎元年五月福王是登位福州以後，才因獲授福建廣東招撫使之命而開始主舶政。陳先生的主要論據有二：一是「閩書」卷五二「景炎元年，授福建廣東招撫使，總海舶。」條；二是明嘉靖三十四年修「清源金氏族譜」附錄的「麗史」的「宋季有蒲壽庚、蒲壽成，以平海寇得官。壽庚爲招撫使，主市舶。」條。由此引申，蒲壽庚提舶竟不足七月。【註二五】這個推論似乎跟「瀛國公紀」所載相差太遠，證據亦不充份。不過蒲壽庚提舶可能不到十年，這也並非無跡可尋。「宋史」「瀛國公紀」德佑元年（一二七五）三月壬申朔條記：

「詔復茶鹽市舶法。似道諸不恤民之政，次第除之。……」

同年五月甲午條記：

「……罷市舶分司，令通判任舶事。……」

宋代無「茶鹽市舶法」，恐指「茶鹽、市舶」之法。賈似道必曾改動市舶法，這裡才有復市舶法之舉。惜文獻不詳其事。然一二七五年五月時曾頒令通判任舶事的規定，則蒲壽庚提舶至少應以此爲上事。此外，南宋晚期泉州市舶使之任，或屬諸宗室，或由知州兼舶，他如王橦等亦曾知他州，並非低級官吏。【註二六】可見非文官士大夫出身的蒲壽庚在正常情況下並無提舶的可能。非正常情況如德佑、景炎之際，宋室大勢已去，整個皇朝正在土崩瓦解之中，這時任命不循常規，倒是不難理解之事。

要之，蒲壽庚提舉泉州市舶爲期不長，泉州市舶使權力亦有限，他不可能由此建立起對泉州所有海舶的絕對控制。不過蒲氏爲泉州海商鉅賈，本身擁有爲數可觀的海舶，當無疑問。

「宋史」所載蒲壽庚的另一項官職是招撫使。這便引入了蒲壽庚個人擁有多大的軍事力量的問題。在前賢的著作裏，討論這個職位的很少。「文獻通考」云：

「招撫使，不常置。建炎初，李綱秉政。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未及出師而廢。三十二年，孝宗即位，以成閔、張子蓋、李顯忠三大將爲湖北、京西、淮東西招撫使。子蓋死，劉寶代之。未幾結局，官吏盡罷。開禧二年，山東及京東西北路並置使招撫，後皆罷。」【註二七】

「宋會要輯稿」亦有類似記載云：

「（紹興十年，一一四一）以少師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劉光世特授太保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隆興元年，一一六三）詔安慶節度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充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寶兼淮東路招撫使節制本路軍馬。……（開禧二年，一二〇六）詔……馬步軍都總管郭倪兼山東京東路招撫使；武經大夫鄂州江陵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趙淳兼京西北路招撫使。……」【註

由此觀之，招撫使在宋代雖非常置軍職，但受命者主要是負有重要任務的高級將領，其統屬區域也在往以路為單位。在正常情況下，蒲壽庚按理並無相應的品位接受如此重要的軍職。唯有在德佑、景炎之際，尤其是景炎元年五月昞即位福州時，才會有這樣不次擢用的情況。【註二九】若然，則蒲壽庚這個招撫使之職，並不是他握有武力的原因，而毋寧是二王承認其既成勢力的結果。

蒲壽庚的勢力怎樣結成容待下文分析，但在景炎元年受招撫任時，這股勢力範圍究竟有多大？「宋史」卷四七「瀛國公紀」云：

「（景炎元年）八月，漳州亂，命陳文龍為閩、廣宣撫使以討之。……（丙子）以王積翁為福建提刑、招捕使，知南劍州，備禦上三郡；黃恮為同提刑、招捕使，知漳州，備禦下三郡。……九月，復以陳文龍知興化軍。……（十一月）阿剌罕兵至建寧府，執守臣趙崇鑑，知邵武軍趙時賞、知南劍州王積翁皆棄城去。……（十二月）戊辰，蒲壽庚及知州田真子以城降。知興化軍陳文龍嬰城不下，……（乙酉）文龍被執，不屈死。……（景炎二年正月壬寅）文天祥走漳州。……」

同書卷四一八「文天祥傳」亦云：

「（正月）大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四月，入梅州。」

是見宋室的福建防禦部署原分兩區。山區的建寧、邵武、南劍州為一線，由王積翁以提刑、招捕使身節制。沿海的泉、漳、興化則歸同提刑、招捕使黃恮節制。當然王、黃二人除所知州郡外，是否真能調動其轄區內其他二州兵民，尚難斷定，而且這個部署為時僅兩月，便在元軍入閩之際，全面崩

解，六州都差不多不戰而降，也很難證明黃恮可以指揮泉州的蒲壽庚。但下三州裏，陳文龍守興化，元軍破城不屈而死；漳州在蒲壽庚降元後顯然仍在文天祥控制下達四月之久。至少說明了蒲壽庚的勢力在降元時絕對沒有超過泉州一州之境。

以上是基於「宋史」的招撫使記載而作出的討論，但蒲壽庚有沒有別的官職在身，可以賦予他一定的軍權？這一節在正史及明人編的幾部私家史著都沒有提及。但晚明何喬遠「閩書」卷一五二有如下的記載：

「蒲壽庚，其先西域人。壽庚少豪俠無賴。咸淳末，與其兄壽崧平海寇有功，累官福建安撫沿海都制置使。景炎元年，授福建廣東招撫使，總海舶。」【註三〇】

這段文字提供了蒲氏的兩項官稱：福建安撫沿海都制置使及福建廣東招撫使。後者問題比較簡單，因為上文已論述蒲壽庚在景炎元年中始有可能得到招撫使這類頭銜，他的權力範圍也絕不會超過泉州一州之地。所以「福建廣東」這一冠詞即使為真，亦不外空銜，本身沒有權力上的實質意義。羅香林先生引同段文字時作「福建東建招撫使」，或所用版本有異？【註三一】但不管「廣東」抑「東建」，既是虛銜，也就無關宏旨。

至於蒲壽庚曾否官至福建安撫沿海都制置使，則是關鍵性的問題。這一節的文獻記載最早見於晚明崇禎三年（一六三〇）成書的何喬遠「閩書」，茲將書中有關文字全段抄錄如下：

「宋幼主過泉城。宋宗室欲應之。守郡者蒲壽庚閉門不納。及張世傑回軍攻城。宗室又欲應之。壽庚置酒延宗室，欲與議守城事；酒中盡殺之。『泉志』：蒲壽庚，其先西域人，總諸蕃互市，

居廣州。至壽庚父開宗，徙於泉。壽庚少豪俠無賴。咸淳末，與其兄壽歲平海寇有功，累官福建安撫沿海都制置使。景炎元年，授福建廣東招撫使，總海船。景炎入海，航泉州港，分淮兵二千五百人，命壽庚將海舟以從。壽庚閉門拒命，與州司馬田真子上表降元。明年七月，張世傑自海上回，攻城。壽庚遣其黨孫勝夫詣杭，求峻都援兵。自與尤永賢、王與、金泳協謀拒守，盡殺淮軍、宗子之在城者。攻凡九十日，不下。世傑解去。改鎮國上將軍，參知政事。勝夫等各進官有差。初，壽歲自宋時仕至知吉州，逆計宋事已去，辭不赴。壽庚迎降及殲淮兵、宗子，皆壽歲陰為之謀。事成，乃伴著野人服，入法石山，若無其事者。壽庚長子師文，尤暴悍嗜殺，淮兵、宗子之死，師文力居多。元以壽庚有功，官其子孫，多至顯達。泉人避其薰炎者十餘年。元亡乃已。皇朝太祖禁蒲姓者，不得讀書入仕。」【註三二】

上文述蒲壽庚於咸淳末年（一二七四）因退海賊功而得官，什麼官不詳，但明言「累官福建安撫沿海都制置使」，即在入官後始累昇為福建安撫使兼沿海都制置使。這官職有兩部份，先說福建安撫使。

現存可資比對的明代方志有弘治三年（一四九〇）刊行的黃仲昭「八閩通志」、萬曆四十年（一六一二）成書的陽思謙「萬曆泉州府志」、及嘉靖五年（一五二六）柴鑣修的「嘉靖永春縣志」。三者提及蒲壽庚拒宋主降元時的官位，或言守臣，或言沿海制置使，但無安撫之稱。【註三三】元人文字裏提到蒲壽庚降元時官職者多謂守臣、知府、太守，亦無安撫之說。【註三四】此其可疑之一。

「宋史」一六七「職官志」云：「舊制，安撫總一路兵政。以知州兼充，太中大夫以上，或曾歷侍從乃得之，品卑者止稱主管某路安撫司公事。……（慶元五年，一一九九）臣僚言：遴選帥司，除

嘗任執政外，兩制從官必曾經作郡、庶官必曾任憲漕實有治績者。從之。」同書卷一六九記紹興以後文階內太中大夫位於開府儀同三司以下十一階侍從官之末，從四品，較卿、監、正郎尚高，【註三五】南宋選用帥臣之嚴，可見一斑。蒲壽庚咸淳末始因助退海賊功而得官，酬報這類功勞在南宋末不會超過成忠郎之類的正從八品小使臣武階。【註三六】據紹興釐正後的武階序列，小使臣共八階，合大使臣二階為三班使臣，其上另有諸司副使八階、橫行副使十二階、諸司正使八階和橫行十三階，始至最高的太尉。如前引「宋會要輯稿」的「武經大夫鄂州江陵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趙淳兼京西北路招撫使」，趙淳無疑已屬相當高級的將領，但只是諸司正使裏第六階的武經大夫。蒲壽庚因禦寇功而得的官，只能是低級武官。宋例三班使臣初任多判場務監當官等下級財務官，再歷任監押、巡檢等地方低級軍官，始有獲知縣差事之望。【註三七】今蒲壽庚兩年間由極低級的武官，竟能累昇至資深文官始能出任的帥職，這樣的事恐怕不會在宋代發生吧。此疑點之二。

宋代福建安撫使例由福州知州所兼。「道光福建通志」列出了直至宋末出任此職者的名單，最後三人為趙順孫、益王昞及秀王趙與暉，並沒有蒲壽庚。【註三八】「宋史」卷四六「度宗紀」紀咸淳十年二月以趙順孫為福建安撫。卷四七「瀛國公紀」記德佑二年正月曾封昞為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但未成行而臨安降。又記昞從溫州入閩前，曾以秀王趙與暉為福建察訪使兼安撫、知西外宗正，先至福建撫諭臣民及宗室。則一二七四至七六年間福建安撫之任亦不落於蒲壽庚之手。又蒲壽庚此時人居泉州，其勢力範圍也不出一州之境，如何能利用在福州的福建安撫司以呈威？此其不可信之三。

此外，沿海都制置使也是一個管轄範圍相當大的軍職。桑原先生引「宋史」卷一六七「職官志」

以下一條：

「又有沿海制置使。……然其職止肅清海道，節制水軍。」

論沿海制置使為主掌沿海防禦之官；又論沿海都制置使乃宋末新設而位更在沿海制置使之上。【註三九】若蒲壽庚果任如此重要水軍職位，宜其海上勢力龐大無比。然「宋史」此段原文「又有沿海制置使」及「然其職」兩句間，原有「以明州守臣領之。」語。這句最是關鍵。加上這一句，整段解釋沿海制置使的文字便和泉州蒲壽庚風馬牛不相及。再檢「宋史」卷四一四「葉夢鼎傳」，夢鼎在德祐元年授判慶元府沿海制置大使，雖然沒有赴任，亦見沿海制置使此時仍與明州守臣任命結合。又明人趙弼「效顰集」亦載元人人臨安時明守兼沿海制置使為趙孟傳。【註四〇】則蒲氏曾任沿海制置使一節，必無其事，或竟出於後人訛傳。至於「沿海都制置使」一名，只載於「閩書」；其作者何喬遠參予編修的「萬曆泉州府志」也只作「沿海制置使」。可知更不可盡信。【註四一】

從上文的討論看，蒲壽庚在景炎元年五月前可能提舉市舶約一年多。景炎改元後或獲授招撫使的虛銜。說他累官福建安撫兼沿海都制置使，大約只是晚明出現的一個訛傳。但可以肯定的是蒲壽庚此時在泉州已擁有相當的勢力。這股勢力的形成一部份由於他在咸淳未曾幫助地方官員擊退海賊，或因而組織起一支私人性質的民兵。然而憑藉這般微薄的權力基礎，在短暫的時間內，如何能夠成爲泉州一地的土霸王？他在泉州地方上的政治甚至軍事權力既非來自其仕宋官職，又從何而來？這個問題文獻上沒有直接的答案，以下試由當時泉州的社會勢力結構作出初步的分析。

(三) 南宋末年泉州地方軍事形勢與地方精英份子

宋後期泉州一地究竟駐扎了多少軍隊？「乾隆泉州府志」記載最爲詳盡，【註四二】大致上南宋後期泉州軍旅有以下幾類：

(1) 禁軍

威果第二十六指揮，隸侍衛步軍司，兵額五一〇人。

全捷第十指揮，屬殿前司，兵額五一〇人。

左翼軍，屬殿前司，兵額五千，但駐泉州者只有一八八二人；內馬步一軍一三三一人，水軍五五一人。【註四三】

(2) 廂軍

廣節指揮，管額二五七人。

不教閱保節指揮，共額一九八三人。

壯城指揮，管額二〇三人。專充修城。

牢城指揮、寧節指揮及剩員指揮，管額不詳，但專用以處置罪徒及待養老兵。

(3) 諸寨土軍及諸縣弓手

土兵共五寨：小兜巡檢寨三一〇人、四縣同巡檢寨三二五人、漳泉都巡檢寨二九〇人、石井巡檢

寨三六〇人、三縣巡檢寨一二五人。

縣弓手屬於役法，責地方警捕等役，各縣管額數目不等。

這些軍隊裏威果、全捷爲非正規軍的禁軍，人數不多，而且文獻上從不見有關他們事蹟的任何記載，相信多半與廂軍弓手一樣淪爲充地方官吏差遣的役兵。【註四四】此外，能戰的恐怕只有土兵及左翼軍。但土兵人數較少，分散各偏遠縣份，統屬不一，裝備訓練亦遠遜正規軍隊。不難想像在景炎元年那種關鍵時刻，駐泉州各支軍隊裏，能起決定作用的，自非集中州城的左翼軍莫屬。【註四五】尤有進者，世傑派出久經戰陣的淮兵駐泉，其後竟被蒲壽庚全數殲滅，【註四六】若光靠蒲氏平海賊時招集而成的民兵，怎能辦到？這說明了左翼軍的向背，事實上決定了景炎元年杪泉州整個政治演變的結果。這支軍隊支持蒲壽庚降元，還有一樣旁證：「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四「元軍制」云：「後設上中下三萬戶府，以蒙古漢人新附軍相參。又以湖翼萬戶府來泉州戍。又建泉州左副翼萬戶府，以宋殿前司左翼軍隸焉。」則左翼軍必曾爲元立效命之功，元人始特設萬戶府以安置其全軍。

蒲壽庚能降元，除了本人的家勢和政治經濟影響力，還得依靠左翼軍的衷心支持。那左翼軍是些什麼人？由誰來指揮？「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四「殿前左翼軍」條解釋其成立及發展經過大略如下：

「紹興十五年，命統制劉寶討汀虔潮惠山寇，往來諸州，泉士民乞留寶收剿餘黨，於是詔本路帥司統領陳敏及汀漳二州兵合二千七百七十五人，充殿前司左翼軍，聽寶節制。寶回，敏代統其軍，復選諸州兵少壯千五百人益之。後定駐于泉州，建寨於東禪等院隙地，仍撥將三員，各帶兵五百戍汀漳建三州，又分福州延祥寨水軍一百九十三人，令鄭廣將之來屬。乾道八年，島夷以海

舟人寇，復增善水者合前水軍爲五百五十人，……嘉定十二年，真德秀復以殿司遠在行都，戍將驕騫培克，郡弗能禁，乞以軍隸本州節制。詔從之。端平二年，統制司移置建寧。淳佑六年復駐泉州，與諸州共聽安撫司節制。……」

此軍爲南渡後地方上因平盜而成立的一支新軍，【註四七】雖謂殿師，實全由閩人組成而從未離開福建。又由紹興十五年（一一四五）至宋亡，長期駐扎在泉州，所以其兵員大概也以當地人爲骨幹。

至於左翼軍將領，方志上没有列出名字，幸文獻上仍可見到一鱗半爪。泉州旁郡興化軍人黃仲元（一二三一—一三二二）「四如集」卷四「夏宣武將軍墓誌銘」云：

「宣武諱璟，字元臣。其先自淮入閩，占籍于泉。帳前總轄隱夫之孫，閩門宣贊必勝之子。宣武舊忠訓郎殿前司左翼軍統領。智足應變，勇足御軍，功足決勝。海雲蒲平章（蒲壽庚）器愛之。河漢改色，車書共道，帥殷士而侯服，篚玄黃而臣附。是時奔走先後，捷瑞安（溫州）、捷溫陵（泉州）、捷三陽（潮州），宣武之力居多。觀其所使，知在上之德，觀其所主，知在下之能。平章舉最，太史書勳，迺刻符印，以償優勞。命下。初武德將軍、管軍千戶；再宣武將軍、管軍總管；三管軍上千戶，散官如故。若省都鎮撫、福泉興化鎮守，又行省累署表也。……（宣武）資寵厚，性寬慈，持身廉勤，同土甘苦。時平固圍（養馬也）。……鞍馬餘閑，喜延勝，彥絃壺，嬉笑於鄉黨姻舊。敬尊己者，慈下己者，友敵己者，一無間言。……」

在景炎元年時的左翼軍統領夏璟，無疑絕對支持蒲壽庚降元。文中數其軍功有三役：溫州、泉州及潮州。溫州之役發生於該年十一月甲辰，尚在壽庚降元之前，或有訛誤。【註四八】泉潮二地曾於蒲氏降

元時或其後發生激戰，夏璟必參與其事。按黃仲元咸淳七年進士，調監瑞安府比較務，德佑元年至二年間在溫與陸秀夫相善，行朝立時請其人仕則辭而不就，宋亡歸隱山林。【註四九】觀其經歷，正好目睹蒲壽庚降元事，他的記載應當大體可信。

從其家世背景看，夏璟世居泉州，三代武官，完全符合地方精英的條件。【註五〇】黃仲元「唐御史滔之十二世孫，世爲儒家，」其父「師事瓜山潘公柄、復齋陳公宓二公，實考亭朱子、勉齋黃公之高弟子也。」宋亡不仕，隱居論學亦以濂洛關閩爲導，【註五一】其述夏璟行止稱譽備至，可見夏氏在當地士大夫間亦頗得人望。

除了左翼軍本身的將領外，握有節制左翼軍之權的地方官員，當然也不能忽略。上引「乾隆泉州府志」談左翼軍一段文字清楚說明此軍在南宋後期的節制系統，它基本上由泉州知州直接節制，間接亦聽命於駐福州的福建安撫使。上文亦論景炎元年中的福建安撫使爲秀王與暉，他受命於危亡之際，主要活動於閩北、浙南，不論時間和空間上，都沒有可能建立對泉州左翼軍的控制。故此，泉州知州乃成爲唯一節制左翼軍的上司。

泉州此時的知州是誰，文獻記載並不一致。各方志的宋代泉州知州姓名都只及咸淳初年。記載蒲氏降元經過者，「平宋錄」、「八閩通志」等以蒲壽庚爲泉州知州；「閩書」、「萬曆泉州府志」、「道光福建通志」等謂蒲壽庚與「州司馬」田真子降；「宋史」、元人陳桎「通鑑續編」則作知泉州田真子。【註五二】上文論蒲壽庚官歷已詳，其非知州亦十分明顯。或元人人閩時以蒲壽庚爲泉州一地降官之首領，直覺上把他當成泉州知州。至於州司馬田真子一說也不能成立，因爲唐代州府上僚中雖

有州司馬之重要職位，但宋代州軍政府組織內卻並無此職。【註五三】由此觀之，「宋史」的說法大概比較可信。「萬曆泉州府志」卷十七「趙必暉傳」云：

「益王即位福州，泉州招撫使蒲壽庚叛，與州司馬田真子謀降元。必暉逃瓷窯村，真子遣兵勒還草降表，……」

明言田真子有調遣泉州軍隊之權，與上文論泉州知州節制左翼軍之說正相合。

這位在宋末緊急關頭節制著左翼軍的田真子，上述各種文獻都沒有記載其背景，降元後也好像突然消聲匿跡。幸而此人亦中進士，名列寶佑四年（一二五六）文天祥榜。檢「寶佑登科錄」第一甲第八人「田真子」有如下的資料：

字正甫，小名正甫，小字
年三十四，十月十五日酉時生
治詩賦免舉
曾祖日新
第五永感下
外氏張
兄弟
娶吳氏
祖德榮
父宗迪功郎

本貫泉州晉江縣，高祖安撫爲戶。【註五四】

據此，田氏至真子約落籍泉州五代，高祖曾任安撫使，官位不低，接著兩代雖無官，父親復得迪功郎小官，真子本人能中甲科第八名，這個家庭可說是泉州地方精英無疑。

除夏、田二人最爲關鍵外，出力輔助蒲壽庚降元者恐亦不乏其人。王重民先生早檢出「嘉靖永春縣志」所載「叛臣」林純子及顏伯錄二人事蹟，以論有泉州士紳協叛的事實。【註五五】茲引錄二人傳

文如下：

「林純子，字仲卿，業儒而通武備。宋季以邊賞授承節郎，監秀之華亭鎮。鄰境有寇，銳於守禦，民賴以安。至元丁丑，沿海制置使蒲壽庚以泉城降元，純子以援城功授忠翊校尉、永春縣達魯花赤，民愛而留之，歷兩考，遂歸田里，不復任。中歲卜居城西，日與朋友講論孔孟之學，屏絕異端邪說。有四書解，各已脫稿。年七十四卒。」

又：

「顏伯錄，字疇叔，尚書械之姪孫。幼孤，立志于學。及長，通春秋，方銳志進取而科第廢矣。元至元丁丑蒲壽庚降元，張少保來攻城，既解去，壽庚以全城功歸諸故家，薦授從仕郎、廣州路南海縣尹。辭不赴。所居亭館多種梅，故自號梅野。謝絕人事，日與賓客觴詠。後得胃疾，悉屏去醫禱，以付命於天，命其子孫以文公家禮治喪事，遂倏然而逝，年五十有四。」

林純子以援城功授永春縣達魯花赤，其為蒲壽庚一黨，並曾效命疆場，至為明顯。其人因邊賞而可得承節郎，或先世已仕，或本人立功，其為官戶則無疑，觀其告隱山林後致力道學之教，注解四書，仕元亦有政聲，可算是泉州士大夫之屬。「嘉靖永春縣志」謂純子舊志（嘉靖志？）列名宦傳，則林氏在泉州迄明代中葉仍頗負清望。伯錄雖沒有仕元，但世傑攻泉州不克，解圍而去，蒲壽庚「以全城功歸諸故家」，內有他的一份，很難說他没有參與其事。伯錄為尚書顏械之後，治春秋，守朱子家禮，當然屬於泉州的地方精英份子。

考經歷類似顏伯錄的尚有鄭曾子及莊彌邵。「萬曆泉州府志」卷十八「鄭曾子傳」云：

「鄭曾子，字子可。晉江人。咸淳十年，遊太學。景炎丙子，隨蹕三山，以迪功郎為潮州司法。未行，泉州降元。蒲壽庚薦授武略將軍、梅州路治中。不受。閑居終身。平生個儻急義，樂道人之善，是非曲直，正言無諱。郡縣士大夫有疑難事，必造廬咨焉。……」

同卷又記：

「莊彌邵，夏孫也。以蔭補承務郎，監福州水口鎮。累擢軍器監。輪對以進德修業為言。……上嘉納之。立朝多所論諫，與弟刑部郎中彌大咸有聲。宋亡，棄官不仕。時蒲壽庚附元為中書左丞，辟宋故臣之在泉者復其官，彌邵改肇慶路治中，彌大改廣州路治中，並不赴。」

二人均仕宋為官，莊氏尤為溫陵望族之一，蒲壽庚降元後薦其任官，一若林、顏之例，豈無瓜田李下之嫌。

此外，「閩書」卷一五二又有以下的記事：

「明年（景炎二年）七月，張世傑自海上回，攻城。壽庚遣其黨孫勝夫詣杭，求峻都援兵。自與尤永賢、王與、金泳協謀拒守，盡殺淮軍宗子之在城者。攻凡九十日，不下。世傑解去。改鎮國將軍、參知政事。勝夫等各進官有差。……」

此段文字提及幾個蒲氏的黨羽：孫勝夫、尤永賢、王與及金泳。有關他們的記載極少，如「島夷志略」吳鑑序云：

「世祖皇帝既平宋氏，始命正奉大夫工部尚書海外諸蕃宣慰使蒲師文（蒲壽庚子），與其副孫勝夫、尤永賢，通道外國，宣撫諸夷。獨爪哇不服，遂命平章高興、史弼等帥舟師以討之。」【註

五六】

又「元史」卷二一〇「占城傳」云：

「（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十二月，遣兵部侍郎教化的、總管孟慶元、萬戶孫勝夫與唆都等使占城，諭其王入朝。……（十九年）萬戶何子志、千戶皇甫傑使暹國，宣慰使尤永賢、亞蘭等使馬八兒國，舟經占城，皆被執。故遣兵征之。……（二十年正月）國主棄行宮，燒倉廩，殺永賢、亞蘭等，與其臣逃入山。……」

又同書卷十一「世祖紀」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十一月：

「奉使占城孟慶元、孫勝夫並為廣州宣慰使，兼領出征調度。」

又卷二一〇「爪哇傳」云：

「（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二月，亦黑迷失（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之一）、孫參政先領本省幕官並招諭爪哇等處宣慰司官曲出海牙、楊梓、全忠祖、萬戶張塔刺赤等五百餘人，船十艘，先往招諭之。……」

此孫參政或即孫勝夫？要之，至少孫、尤二人仕元亦至相當高的品位，若非論功行賞，斷不會如此顯貴，可是他們是否泉州士大夫？這一點無法加以證明。前舉黃仲元「夏宣武將軍墓誌銘」繼云：

「男定保，……以父任賜黃組，昭信校尉、福州新軍上千戶、捧萬戶檄、鎮守興化路。娶尤宣尉女它姬。……長女歸莊刑部。……」

此尤宣尉或即廣州宣尉使尤永賢，莊刑部也很可能就是莊彌邵的弟弟刑部郎中莊彌大。若然，倒符合

南宋以還地方精英份子間聯姻攀附的發展。【註五七】

從這些例子看來，蒲壽庚的降元背後確有一股強大的地方精英集團在支持他，他們對當地的政治和防衛事務，都有很大的左右力量，不然憑蒲氏一人一姓之實力，斷不能發揮這麼大的政治效果。

當然，蒲壽庚本人亦出身士大夫之家。有關蒲家家世的說法基本上有兩個：其一，桑原先生據「閩書」「其先西域人，總諸蕃互市，居廣州。至壽庚父開宗，徙於泉。」及鄭所南「心史」「祖南蕃人，富甲兩廣，據泉以叛」兩段，論蒲壽庚父開宗一代始遷泉州。【註五八】其二，羅香林先生據「蒲壽庚家譜」所列蒲氏世系，認為蒲氏可以溯源四川蒲宗孟（譜作孟宗），六世蒲仕賓始以知晉江縣卜居於泉，即蒲壽庚、壽成及壽晟三兄弟之父。【註五九】這兩個說法裏，羅先生立論所據的「蒲壽庚家譜」，已經學者詳加考證，說明其內容頗多杜撰附會之處，並不可信。【註六〇】泉州蒲氏實始於開宗，其人曾參與修建地方先賢祠廟及橋樑，皆有文獻可詳。關於他最重要的記載見於真德秀「重建太守倪公祠記」，記云：

「……其成實（紹定）六年（一二三三）十二月甲申。勸民使為者郡學錄黃龔，為之者承節郎蒲開宗。【註六一】

承節郎為從九品武官小使臣之階，算是最低的官位，可以通過進納賣官而取得。【註六二】可是一旦得官，即已側身官戶形勢之列，而成為地方精英的一份子。蒲壽庚兄壽成曾帶「領衛」一類武職，【註六三】咸淳七年知梅州，其為士大夫類可無疑問。蒲壽庚家勢背景如此，方能在宋朝中央解體之際，振臂一呼而成為心懷異志的泉州地方精英份子的首領。當然，蒲壽庚亦必須是個領袖之材，才能於紛

亂時局之中，驟然脫穎而出。

（四）從地方精英權力結構論蒲氏降元的社會背景

最後附論宋季泉州地方精英份子的權力結構。這時的泉州地方精英份子大體可分作三派：宗室派、抗元派、及降元派。

南渡初泉州置南外宗正司，以安置部份宗室，由州政府負支給之責。其後宗族繁衍，漸成本州財政沉重負擔。挾著宗室俸祿，他們之中不少人直接介入當地獲利豐厚的海上貿易，而且因為宗室在州郡的影響力十分鉅大，常常左右泉州市舶法例的正常運作，從中牟取暴利，也很容易恃勢橫暴，干涉州政，欺壓其他商賈百姓。自桑原先生以來，討論這問題的人很多，這裡不擬細說。【註六四】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宗室並不太受當地一般宋賈蕃商歡迎，彼此在商業上甚至成爲不平等的競爭對手，而勝方則可以想像往往歸於宗室。另一方面，宋廷防範宗室亦十分嚴密，【註六五】故此他們雖然有財有勢，卻沒有可能發展出一種集團式的地方武力。而且南外宗室府第多在泉州城內，與地方政府近在咫尺，也很難培養出一種鄉里士紳和鄉民間的密切關係，一旦面臨危亡之秋，亦無法動員其他百姓襄助。

其次是抗元派。宋季大局已去，趙祚將盡之際，無疑仍有不少忠臣義士，知不可爲而爲，與元人周旋到底。如文天祥、陸秀夫等皆名垂青史。泉州一地的精英份子中，當亦不乏其人。如「乾隆泉州

府志」卷五七「宋忠義」有「莊思齊傳」云：

「莊思齊，晉江人。與弟公茂俱佑孫之子。初佑孫始家青陽，有子五人。宋幼主南奔，五人者與潮州司戶參軍蔡若濟，倡義迎幼主駕，語張世傑：『欲效鉛刀一割之用。』張壯之。會蒲壽庚閉城拒駕，殺宗室之在城中者，遂以不果。後三人懼壽庚之殺，散處四方，而獨思齊、公茂還守青陽故山，以奉父之老。稱忠孝並至云。」

同卷又有「呂四十七傳」云：

「呂四十七，南安人〔注：呂晦文、呂大奎之姪〕。幼主人閩，四十七率白徒千人迎而從之。幼帝義焉，封爲恭懿侯、食實封千戶。繇是黃姓、曾姓者，聞風各以千人至。幼帝崩，杜名隱處終身。」

都是很好的例子。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呂氏能臨時動員民兵上千人，又黃、曾兩姓也具有同樣的實力。這些都屬於當地的大族。莊、呂二人且可知爲形勢之家。【註六六】這批忠於宋室的精英份子無疑受到儒家貞忠觀念的深固影響。幼主即位福州後，自然企望趙宋可以苟延殘喘，因而也與泉州宗室們聯成一氣。可惜此派人士勢力並不壯大，雖然能動員千計的民兵，但都是烏合之衆，無法與訓練有素的正規軍左翼軍對抗，更遑論跟縱橫天下的元軍交鋒。

最後的降元派，則是當時普遍的現象。他們屬於地方精英，不少也飽讀詩書，甚至師承最講究義理的道學，治春秋、四書、朱學之類，且享盛名。可是時窮節現，大廈將傾之際，不免以個人、家族及地方的利益爲依歸。忠君之「忠」依然，特其「君」則易爲元主。此或竟守儒家天命無常之義？重

要的是，此輩中人及明代仍多為鄉議所接受，前引林純子、顏伯錄在「舊志」即分別列入名宦、隱逸傳。同時，此派與地方上的賈胡華商大概關係較佳，能夠得到他們的支持。前述林喬為蒲八官人說項，即一例。此類人物之中，具領袖之材，亦官亦商，胡裔而漢化如蒲壽庚者，自易受眾所推而成為首領。當時這派勢力似乎較其他兩派為盛，但最關鍵之處是他們控制了當地的兵權，故此在其後的較量中穩佔上風。

綜觀當時形勢，拒宋降元，盡殺宗室，也可說是泉州地方精英份子間的一次大衝突。結果宗室派及抗元派於景炎元年年被擊潰而徹底剷除。【註六七】「宋史」謂屠「宗室、士大夫、淮兵」的「士大夫」，當僅指抗元派者而言。換言之，蒲壽庚降元並非一人一姓之事，【註六八】更沒有異族人在宋代楚材晉用，舉足輕重的問題。這次事件，毋寧是泉州地方勢力重組的轉捩點，入元乃出現西域人與本地人結合的新權力結構。

【附註】

- 註一：桑原隲藏「宋末の提舉市舶西域人蒲壽庚に就いて」，「史學雜誌」第二六編第十號（一九一五年十月），頁一—三五；第二七編第二號（一九一六年二月），頁一—二二；第二七編第五號（一九一六年五月），頁一—二七；第二八編第九號（一九一七年九月），頁二九—五二；第二九編第十號（一九一八年十月），頁三〇—六〇。
- 註二：桑原隲藏「蒲壽庚の事蹟」（東京：岩波書店，一九三五年）。

- 註三：桑原隲藏著，馮攸譯，「唐宋元時代中西交通史」（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二九年）；（臺北：中華版改名「中國阿剌伯海上交通史」）。又桑原隲藏著，陳裕菁譯，「蒲壽庚考」（上海：中華書局，一九二九年）。

- 註四：羅香林「蒲壽庚研究」（香港：中國學社，一九五九年）；此書前以「蒲壽庚傳」（臺北：中華文化學術基金會，一九五五年）為名於臺灣出版。

- 註五：Lo Jung-pang, "Maritime Commerc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Sung Navy,"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2 (1969): 57-101; "The Emergence of China as a Sea Power During the late Sung and Early Yuan Periods," *Far Eastern Quarterly* 14 (August 1955): 489-503。

- 註六：前嶋信次「泉州の波斯人と蒲壽庚」，收「東西文化交流の諸相」（東京：「東西文化交流の諸相」刊行會，一九七一年），頁三三九—四〇二。張秀民「蒲壽庚為占城人（Cham）說」，「益世報」【史地周刊】第七一期（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九日）；「占城人（Chams）移入中國考」，「學原」第二卷第七期（一九四八年），頁四一—五九；「蒲壽庚為占城人非阿拉伯人說」，「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七九年第一期，頁六八—七三；杉本直治郎「蒲壽庚の國籍問題」，「東洋史研究」第十一卷第五／六號（一九五二年七月），頁六六—七六。

- 註七：李東華「泉州與我國中古的海上交通」（臺北：學生書局，一九八五）。

- 註八：這一點在西方的學術界已成為極普遍的看法，如 Morris Rossabi, *Khubilai Kha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p. 92-93。

- 註九：這類例子不勝枚舉，重要者如知復州翟貴、權知漢陽軍王儀、權守鄂州張晏然、知黃州陳奕、知安慶

府范文虎、知平江府潛說友等，皆以城降。可參考脫脫「宋史」（上海：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卷四十七，「瀛國公紀」。

註一〇：桑原隲藏「中國阿刺伯海上交通史」，頁二〇三。

註一一：同註四，頁二。

註一二：同註一〇，頁二三三～二三四。

註一三：宋元兩軍在長江上會戰，宋師失利例子不少。如「宋史」卷四五一「姜才傳」記賈似道督師抗元時孫虎臣敗績丁家洲事云：「（元）大軍設炮架穀車弩江濱，中流數千艘，旌旗聯互，鼓行而下。……於是諸軍皆潰。」同卷「張世傑傳」記焦山之役世傑「與劉師勇諸將大出師焦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非有號令毋發碇。示以必死。元帥阿朮載穀士以火矢攻之，世傑兵亂，無敢發碇，赴江死者萬餘人，大敗奔圖山。」宋濂「元史」（上海：中華書局，一九七六），卷八「世祖紀」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七月條記焦山之役元軍水戰的成功更爲詳細。可參考陳世松等「宋元戰爭」（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一九八八）。及李天鳴「宋元戰爭中元軍的水陸協同三面夾擊水戰戰法」，收宋晞編「國際宋史研究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頁二七三～二九四。

註一四：余又蓀「宋元中日關係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四），頁四七～五七；九七～一一六；William Henthorn, *Korea: The Mongol Invasion*. (Leiden: E. J. Brill, 1963)。

註一五：關係元蒙水軍的問題，承蕭啓慶教授借閱其即將出版的論文，並惠予甚多寶貴意見，謹致謝忱。參考蕭啓慶「蒙元水軍之興起與蒙宋戰爭」，「漢學研究」第八卷第二期（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註一六：對於蒲壽庚提舉泉舶甚久的論點，最近已有人提出疑問，詳下文。但在持此論點的學者中，也有不同

的意見。桑原先生認爲近三十年。羅香林先生認爲只有十七年左右。俱詳下文。

註一七：桑原隲藏，同註一〇，頁二二二～二二三。Lo Jung-pang, "Maritime Commerce," p. 98。

註一八：同註一〇，頁二二二。

註一九：關於宋代市舶司的著作，最重要的是藤田豐八「宋代の市舶司及び市舶條例」，「東洋學報」第七卷第二號（一九一七年五月），頁一五九～二四六；石文濟「宋代市舶司之設置與職權」，「史學彙刊」第一期（一九八六），頁四五～一六〇。

註二〇：So Kee Long, "Financial Crisis & Local Economy: Ch'ian-chou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oung Pao*, forthcoming.

註二一：同註一〇，頁二〇〇～二〇一。

註二二：同註四，頁三九～四一。

註二三：泉州九日山祈風石刻最晚者爲趙希恠等的一塊，碑文云：「咸淳丙寅，南至後十日，禱風此山。知宗兼郡事古汴趙希恠安宅、提舉縵事眉山王櫺茂悅：」參考陳自強「蒲壽庚宋末提舉市舶三十年」說考辨，「中國史研究」，一九八三，第一期，頁一六一；土肥祐子「南宋中期以後における泉州の海外貿易」，「お茶の水史學」第二三號（一九八〇），頁五六。

註二四：周密「癸辛雜識別集」（「四庫全書」本）卷上。

註二五：陳自強「蒲壽庚宋末提舉市舶三十年」說考辨，頁一六二～一六三。

註二六：如趙師耕、方澄孫等皆以知州兼舶，見吳文良「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文物」一九六二年第十一期，頁三三～四七。方豪「宋泉州等地之祈風」，「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學生書局，一九六

九），下冊，頁二〇一—二四六。宋晞「宋泉州南安九日山石刻之研究」，收「宋史研究論叢」（臺北：國防研究院，一九六二），頁一五六—二〇四；「吳文良『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讀後」，收「宋史研究論叢」第二輯（臺北：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一九八〇），頁二一—二三〇。王櫛曾知郴州，見周密「癸辛雜識別集」（「裨海」本），卷下「鈿屏十事」條。土肥祐子「宋代之泉州貿易と宗室」，收中嶋敏先生古稀記念事業會編「中嶋敏先生古稀記念論集」（東京：汲古書院，一九八一），下卷，頁一七三—一九三。

註二七：馬端臨「文獻通考」（臺北：新興書局，一九六二），卷六二「職官考·招撫使」。「宋史」卷一六七「職官志·招撫使」條大體一致，惟增「紹興十年，劉光世爲三京招撫使，踰年而罷。」一語。

註二八：「宋會要輯稿」（臺北：新文豐出版社，一九六七），「職官」四二之六七—六八，「招撫使」。

註二九：姚燧「牧庵集」（「聚珍版叢書」本），卷十六「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云：「立福王。傳檄海嶺之州曰：『余復廣之東西。』豪傑陷其爵賞，爭起爲應，裂裳爲旗，荷矛爲兵者，動萬爲羣。」此雖站在元臣立場而言，但當時爲了招集各地民間力量來支持新成立的行朝而大派官銜，也不難想像。

註三〇：何喬遠「閩書」（內閣文庫藏崇禎三年刊本），卷一五二「畜德志」。

註三一：同註四，頁四一。

註三二：同註三〇。

註三三：黃仲昭「八閩通志」（弘治三年刊本。臺北：學生書局「中國史學叢書」第三編，一九八七），卷八六「拾遺」；陽思謙「萬曆泉州府志」（萬曆四十年刊本。臺北：學生書局「中國史學叢書」第三編，一九八七），卷二四「雜志·盜賊類」；柴鑣「嘉靖永春縣志」（嘉靖五年抄本。臺北：永春文

獻社，一九七三）。「莊彌邵傳」，頁三四五及「林純子傳」，頁三六六。黃書及柴書「莊傳」均作「守臣蒲壽庚」。陽書及柴書「林傳」則作「沿海制置使蒲壽庚」。柴書「林傳」後有案語言林純子本傳在「舊志」列名宦類。陽書前有隆慶志（一五六八）黃光昇序及萬曆志黃鳳翔序。兩序均謂嘉靖志（一五二五）纂修前泉州只有宋代的淳祐志和嘉定志，則嘉靖修志時元志可能已經散失。若然，柴書成於嘉靖五年（一五二六），其所謂「舊志」或指嘉靖志？由此觀之，柴書及陽書很可能沒法參考到元人纂修的泉州方志。另一方面，黃書記此條後注云：「出本志。」按「八閩通志」成於弘治三年（一四九〇），「本志」不可能指嘉靖志。自宋亡至弘治三年，泉州方志僅有元人所編的「泉州路清源志」及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二）成書的吳鑑「清源續志」。當爲黃仲昭修書所據。柴書「莊傳」亦作「守臣」，或取諸「八閩通志」？

註三四：如劉敏中「平宋錄」（「四庫全書」本），卷中；王磐「趙國忠獻公神道碑」，收「嘉靖藁城縣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嘉靖十三年修，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卷九。

註三五：關於宋代文官品階，可參看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京都：同朋社，一九八五），頁三—九八；Winston W. Lo,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ivil Service of Su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7), pp.141—170。

註三六：如咸淳間北方歸正人不少，其中也不乏對元作戰立功的人，他們對宋廷的價值絕對超過擊退海賊的蒲壽庚，可是一般的授官仍是小使臣最低的幾階如承信郎、承節郎、成忠郎等。見「宋史」卷四六「度宗本紀」。

註三七：關於宋代武官官階，參看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頁九九—一八四；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

（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三），頁二四二～二五〇。關於三班使臣任官，見梅原郁同書，頁一三。

註三八：陳壽祺「道光福建通志」（華文書局影印同治十年重刊本），卷九十「宋職官·安撫使」。

註三九：同註一〇，頁二三〇。

註四〇：趙弼「效顰集」（內閣文庫藏乾隆六十年抄本）。「延祐四明志」（大化書局「宋元地方志叢書」影印延祐七年刊本）卷二「宋知府制置姓名」及卷五「趙與權傳」。

註四一：明人文獻裏提及蒲壽庚曾官沿海制置使者除「閩書」外，僅「萬曆泉州府志」及「嘉靖永春縣志」的「林純子傳」。見註三三。從「萬曆泉州府志」書首編修者名單看，「閩書」作者何喬遠亦參予其事，故兩書不能用來互證。然則現存最早的記載是柴書的「林傳」。這個訛說產生，或在十六世紀之初。

註四二：懷布蔭「乾隆泉州府志」（一九六四年臺北朱商羊影印乾隆二十八年刊本），卷二四「宋軍制」。

註四三：關於宋代水軍，參看 Lo Jung-pang, "Maritime Commerce," pp.57-101; "The Emergence of China as a Sea Power," 489-503; 曾我部靜雄「南宋の水軍」，收「宋代政經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一九七四），頁二四九～二七一。關於泉州左翼水軍，參看曾我部靜雄「南宋の貿易港泉州の水軍とその海賊防衛策」，收「宋代政經史の研究」，頁二七二～二九三。

註四四：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頁一八〇～一八二。南宋中期以後泉州遇寇，多由左翼軍出動應付，罕有提及其他禁軍。如真得秀「眞文忠公文集」（「四部叢刊縮編」本）卷八「泉州申樞密院乞推海盜賞狀」；「申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申樞密院乞節制左翼軍狀」。

註四五：「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四載駐泉州左翼軍寨建於「東禪等院隙地。」同書卷一六則記東禪寺在仁風門外東湖畔。故左翼軍基本上是州城的駐軍。

註四六：蒲壽庚誅殺在泉淮兵及宗室事，見「宋史」卷四七「瀛國公紀」。「閩書」卷一五二謂世傑分淮兵二千五百人至泉州，即有誇大，亦可見當時行朝確有調派長期與金人及元人作戰的淮兵進駐城內。

註四七：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頁一八七～一九三。

註四八：「宋史」卷四七「瀛國公紀」。是役福建察訪使兼安撫秀王趙與畢等皆死，宋室在浙江最後的防線遂失，爲元兵入閩的前奏。

註四九：黃仲元「四如集」（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珍本」第十集），卷首宋濂序。

註五〇：關於宋代地方精英份子（local elite）的定義，尤在涉及階層流動問題時，可有不同的看法。最近這方面討論不少，如 Robert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ociety* 42 (December 1982): 365-442; Robert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 The Elite of Fu-chow,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等。一般來說，凡屬官戶之家，亦即當代人擁有官位者，不論高低，已享有一定的特權，連帶具有對當地社會及政治事務的影響力，故此可算是地方精英。關於官戶及其他地方形勢之家的研究不少，參看周藤吉之「宋代官僚制と大土地所有」，（「社會構成史體系」——第二部：東洋社會構成發展」第八回。東京：日本評論社，一九五〇），頁七七～一四三；柳田節子「宋代形勢戶の構成」，收「宋元鄉村制の研究」（東京：創文社，一九八六），頁三五～三七四。至於武官的社會地位，見劉子健「略論宋代武官羣在統治階級中的地位」，收青

山博士古稀紀念宋代史論叢刊行會「青山博士古稀紀念宋代史論叢」(東京：省心書房，一九七四)，頁四七七～四八七。

註五一：同註四九。

註五二：陳經「通鑑續編」(「四庫全書」本)，卷二四景炎元年十二月條。按此書體例仿通鑑綱目，大字分注。同年十一月「帝舟居于泉州港，蒲壽庚作亂，帝遷于潮州。」一條注文云：「帝舟泊泉州港，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則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而沒其資。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宜中、世傑乃奉帝趨潮州。」注文與「瀛國公紀」至為相若，恐即後者所據的史料。又錢士昇「南宋書」(「四朝別史」本)卷六亦有類似記事，或源於此。

註五三：關於唐代州司馬，參考嚴耕望師，「唐代州府上佐與錄事參軍」，「清華學報」新八卷第一及二期合刊(一九七〇年八月)，頁二八四～二八九。宋代州軍行政組織，見「宋史」卷一六七「職官志」。羅香林先生據「乾隆泉州府志」卷三三「選舉一」「田眞子，州司馬，後叛宋，與蒲壽庚降元。」語，認為田眞子未嘗知泉州。見羅香林「蒲壽庚研究」，頁五三，註三。按州司馬之說，目前能見到最早的文獻是「清源金氏族譜」(福建省立圖書館藏抄本)所附的一篇稗史——佚名著「麗史」，其文云：「泉州故多西域人。宋季蒲壽庚、崧以平海寇得官。壽庚為招撫使，主市舶，壽崧為吉州，逆知宋運，迄錄不赴。景炎間益王南巡，駐蹕泉州港口。張世傑以淮兵三千五百人授壽庚。武人暴悍無謀，只壽崧為畫計。益王篤臨城，教壽庚閉門不納，盡殺宗室在泉州者三千餘人，併淮水軍無遺者，與州司馬田眞子詣杭州唆都降之。張世傑回攻九十日不能克。……」按此份族譜修於嘉靖三十四年(一

五五五)，「麗史」之作當更早。晚明何喬遠所撰的「閩書」及其參與編纂的「萬曆泉州府志」當有部份抄自此書。「乾隆泉州府志」的一段文字亦由此而來。但此說源起仍後於「宋史」及「通鑑續編」，故此不能推翻「宋史」的知州之說。當然最重要的理由還是「州司馬」根本不是宋代制度。

註五四：「寶祐登科錄」(「粵雅堂叢書」本)，頁一。「八閩通志」卷四七「舉選」闕田眞子之名。

註五五：王重民「考蒲壽庚降元之年月日——兼記泉州紳士林純子、顏伯錄事」，「大公報」「文史週刊」第三十八期(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四日)。羅香林先生亦據此申論林、顏兩人與蒲壽庚關係甚深。羅香林「蒲壽庚研究」，頁四四～四五。

註五六：汪大淵「島夷志略」(「四庫全書」本)。

註五七：關於士大夫間聯婚的政治和社會意義，見 Robert Hartwell, "Demographic," pp.405-425; Robert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pp.82-104。

註五八：同註一〇，頁一四三～一九九。

註五九：同註四，頁一一～三七。

註六〇：川越泰博「泉州回教徒蒲氏系譜考——『蒲壽庚家譜』先世記事の再檢討」，「東方宗教」第四三卷(一九七四)，頁五一～六六；陳自強「蒲壽崧史料考辨」，「泉州文史」第六、七期合刊(一九八二)，頁七六～八二；「蒲氏兄弟之父——蒲開宗」，「泉州文史」第八期(一九八三)，頁八六～八七。

註六一：眞德秀「眞文忠公文集」卷二五。

註六二：魏月美「宋代進納制度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待兼山論叢·史學編」第七號(一九七四)，頁二三

〕四一。

註六三：余嘉錫認為領衛即環衛官，並謂環衛官指諸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他進一步引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縮編」本）卷二二三「乙丑（一二六五）回蒲領衛啓」，推論此職乃平海盜有功而獲授的將帥之官。見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香港：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卷二三。據「宋史」卷一六六「環衛官」，南宋後期有十六衛，每衛置上將軍、大將軍、將軍，多委任宗室；下另有中郎將、郎將等中級將校，亦環衛之官。考葉適「水心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一九七四），卷二二「厲領衛墓誌銘」云：「君中紹熙元年武舉，任侍衛步軍司計議官、武學諭、閤門舍人，副賀生辰者使於虜。出知安豐軍，復還閤門。出知和州，：就權廬州，俄召授左領衛中郎將。虜內侵，：令君健康防守。虜遁歸，復還領衛。：」則郎將級以上的環衛官慣稱領衛，且其品階已足充知州之任。蒲壽成爲領衛而嘗知梅州，類此，不必定屬將帥之職。

註六四：桑原隲藏，同註一〇，頁二三六～二四〇；土肥祐子「宋代之泉州貿易と宗室」；李東華，同註七；傅宗文「后渚古船：宋季南外宗室海外經商的物證」，「海交史研究」一九八九年第二期，頁七七～八三。

註六五：宋代防範宗室的政策，可參看曾我部靜雄「宋代之宗室」，收「中國社會經濟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一九七六）頁一八九～二二〇；諸戶立雄「宋代之對宗室策について」，「文化」第二二卷第五號（一九五七年七月），頁五三～六九。張邦煒「宋代對宗室的防範」，「北京師範學院學報」一九八八年第一期，頁二五～三一。

註六六：「青陽莊氏族譜」（晉江縣圖書館藏明抄本）。見王連茂「蒲壽庚屠殺南外宗子考」，「泉州文史」

第四期（一九八〇），頁七八。

註六七：王連茂，同上註，頁七五～八二。此文引用兩份重要的資料，對屠殺南外宗子事多所補充。即「宋天源趙氏族譜」（泉州市文管會藏雍正抄本）大德四年（一三〇〇）「南外宗孫由馥府君遺囑」及至正二十年（一三六〇）趙由瑞「濬源圖譜序」。王先生結論是屠宗子在景炎元年十一月與十二月之交；被殺宗子男女老幼三千人。

註六八：時人釋大奎「築城曲」詩有句云：「收取人心養民力，萬一猶能當盜賊，不然共守城者誰，解體一朝救何得。吾聞金湯生馱樞，爲國不在城有無。君不見泉州閉門不納宋天子，當時有城乃如此。」見「夢觀集」（「四庫全書」本），卷二。不難窺見泉州閉門拒駕事件背後巨大支持力量。